

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在党的旗帜下 全军文学征文作品选登

刘洪彪 书

红色信仰的力量

□董保存

大约在20年前,单位一领导问自己20多岁的孩子:“你申请入党了吗?”孩子迟疑了一下,反问:“爸,入党有嘛效益?”听完我们都笑了起来。那是一个讲效益的年代,街上到处都是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益就是生命”。

我把这个“笑话”说给一位当时80岁的老将军听,他却半天没有说话,沉默良久,忧心忡忡地说:“现在还有多少人信仰共产主义呢?”事后他对我说,人还是要有信仰的,信仰能让人高贵和伟大。我们那一代人如果没有信仰是支撑不下来的。信仰是一种精神力量,前些年我们把这种力量说多了,说过了,但要是没有了信仰,就是行尸走肉……老人说这话时,一脸凝重。

老将军的这些话引起我注意。虽然我辈的人入党申请书上都写自己的信仰,却不知道红色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力量。当我再次向这位老人讨教时,老将军说,当生死摆在面前的时候,最能看出信仰的力量。你跟我到老区看看,认识几个人,你就知道了……

于是,我走近了一个又一个信仰坚定者——

新中国36位军事家之一,原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,鄂豫皖红军主要领导人蔡申熙用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,为了信仰可以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。

河口之战,是红四方面军西征前的最后一仗。胡宗南的第一师、俞济时的第八十八师与红军主力相遇,蔡申熙率红二十五军英勇反击,伤亡两千余人,退入河口镇。第二天,蒋介石加派整编第二师投入战场,准备与河口之师构成东西夹击之势。蔡申熙又率部御敌,在仙人洞一带激战两昼夜。援敌陆续加入战斗,从南、北、西三个方向构成包围之势。蔡申熙果断命令部队后撤转移。

蔡申熙说,指挥部队冲锋时,指挥位置要靠前再靠前;撤退时指挥位置要靠后靠后。河口撤退时,他的指挥所就在负责断后的部队中。敌人从三个方向合围,试图把断后的红军吃掉。敌人冲到离他们只有百十来米的地方,警卫员叫他快走,他还在指挥部队撤。警卫员只好架着蔡申熙往回撤。

“放手!”蔡申熙吼道,“没有看见队伍还没撤下来,我不能走!”就在这时,敌人的一

许多年来,人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,知道他对我国导弹、火箭和航天事业,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,知道他是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,却少有人知道他为人清廉、作风正派、淡泊名利的“另类”故事。

这些故事主要发生在钱老的晚年,主要由“拒绝”和“献出”两部分组成。

先说“拒绝”。他拒绝请吃请喝,更拒绝用公款大吃大喝,铺张浪费。他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,包括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参加政协会议,他都坚持会后回家吃饭。许多单位请他作报告,他讲完就走人,从不收受所谓的讲课费,也决不留下吃饭。

他拒绝公款旅游,退出一线领导职务后,他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作学术报告。他只是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后,于1988年夏天带科协的几位副主席到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休过一次假,赴过几次当地有关部门的招待宴会,他不得不出席应酬,但秘书涂元季看得出,他对于这种纯粹是浪费时间的应酬活动是很反感的,回到北京后,他对涂元季说,以后再也不离开北京了,就是天津也不去,谁请也不去。他还说:“我对付这帮家伙的办法就是哪儿也不去。”有人正面请不动,就激他说:“钱老,你知不知道,别人说你架子大,请不动。”他说:“你激我也没用,你们说我架子大,我就架子大。”

他拒绝出国。1955年回国后,他就出过两次国,一次是1957年随聂荣臻元帅到苏联谈判、签署《国防新技术协定》,还有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、德国。以他的名望,想到哪个国家转转都不难,可他坚决不出去,因为有一阵子,出国风日盛,花的当然是公款,也搞不清

是去考察还是借机公款出国游。他曾在一封封信中批评一个去美国、加拿大考察舞台技术的小组说:“一个考察小组共四人,竟有三个是官!才一个科技人员,这正常吗?”

他拒绝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,因为他知道当下的鉴定会名堂很多,如果去了,爱较真的他弄不好就生一肚子气,何必去呢?

他拒绝参加任何“应景”的活动,比如开幕式、揭幕式、剪彩仪式等等,他认为这是浪费他的时间,不如在家看书或思考问题。

他还拒绝题词、写序,拒绝任何礼品,拒绝别人擅自封给他的任何头衔,拒绝为他写传、拍电影、电视剧。所以你现在看不到哪本书是钱学森写的序,看不到任何他的题词。他拒绝了深圳一位老板赠送给他的一幢豪华别墅。就连他80岁生日那天,中国科协办公室送给他半斤茶叶,他也给人家退了回去……

他这一生,拒绝了好多好多,凡是认为不对的,他就坚决拒绝,不留情面。当别人为能戴上两院院士头衔而绞尽脑汁之时,他曾两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,恳切要求辞去院士称号,说自己年老体弱,已不能完成院士应该完成的任务,意思是不能再占着位置不干事了,应该把宝贵的名额让给正值盛年的优秀科学家。

他拒绝,是想独善其身,以实际行动抵制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,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,看到腐败现象得不到解决,他忧愤地写道:“真是心急如火!”

再说说他的“献出”。

早在1958年,他的《工程控制论》在国内出版,中文版稿费有1000多元,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,他二话没说,献给了由他亲手创办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,资助贫困学生买学习用具以及系里购买器材。几十年后,还有当年的学生写文章说,那时钱老出钱给买的计算器仍然保留着。

1962年前后,他的《物理学讲义》和《星际航行概论》出版,得稿费数千元,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,且那个时候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,他上有老下有小,一家人也是勒紧腰带过日子。但是拿到钱,他就作为党费上交给了党小组长。

1978年,全国政协给他的父亲钱均夫先生补发“文革”期间欠下的工资,计3000多元,而他的父亲已于1969年去世,他是唯一的继承人,但他认为父亲去世多年,这笔钱不能要。退给政协会到拒收,怎么办?他故伎重施,全部当做党费上交了。

1994年,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,得100万港元。他思前想后,觉得这笔钱不能留下,于是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会,献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。

2001年,他获得霍英东基金会颁发的科学奖金,也是100万港元,像7年前那样,他再次把这笔钱献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会,他说,中国有60亿亩草原,是农田面积的3倍,把它治理好了,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。

这一年,他献出了很多很多。上面说的,仅只折射出他的金钱观。他说过:“我姓钱,但我不爱钱。”又说:“我是一名科技人员,不是什么大官,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。”

一直忘不掉去年秋天,在他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里,90岁高龄的钱老夫人蒋英教授讲述的一个小故事——钱学森年轻时喜欢绘画,敦煌是他早就向往的地方,他很想去看一看莫高窟的壁画。自从参与火箭导弹研制以来,到他退出一线,20多年的时间里,他无数次到大西北的导弹试验基地,可他却没有去过一次敦煌。我们不解,问为什么呢,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到敦煌,基地派个车接他去看看,并不费什么劲啊。蒋英教授是这样回答我们的,她说:“一是钱学森他太忙,还有一个原因呢,我问过他,他说,我怎么好意思利用工作便利,去游山玩水?同志们会怎么想?结果呢,一直到去世,他都没去过敦煌。”

听到这儿,我的眼睛里忍不住蓄满了泪水。

这一桩桩小事,彰显出钱老高尚的内心世界,别人看到的,是一个形象高大的钱学森,我看得到的,也是一个圣洁的灵魂——安静、明亮、淡然、无私、坦荡、纯粹。一个人物可以过时,一位科学家的成就也会被后人超越,但科学精神是永恒的,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像他的灵魂那样,在历史的长河中将会散发出永远的芬芳。

信任,少将参议!每月有500元的薪金!”“他是个无耻的东西!”方志敏怒火中烧,严正地说:“我不能跟他一样,我不爱爵位,也不爱金钱。”钱协民对方志敏说:“如果不投降,就只有枪毙了。”方志敏坦然地说:“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!但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,我只有走死的一条路。”

在黑暗的囚室里,方志敏与刘畴西、曹仰山等人互相鼓励:“我们为革命而生,更愿为革命而死!到现在无法得生,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,我们就下决心就义。”“我们心体坦然,毫无所惧,我们是视死如归!”方志敏还为大家临刑时拟好了口号,他说:“临刑时要高声地呼,用劲地呼,以表示我们的不屈!”

同时,方志敏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同被囚押的几十名红军团干部,保持高度的革命气节,和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。他给同监的红军团二十师参谋长乔明信写信说:“我们几个负责人,已准备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,敌人一定要杀死我们的。你们不一定死,但要准备坐牢。在监狱中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,为党工作,坚持斗争,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。”乔明信回信说:“亲爱的志敏同志,感谢你有这样的环境里,对我们的了解与信任。请你放心,你的指示我一定坚决执行!”

方志敏被捕后,国民党为了劝降,一方面改善方志敏的生活条件,另一方面找了方志敏的几个同乡同学充当说客,就连“绥靖”公署主任任崇碧也亲自出马。方志敏的回答是:“投降?你们是什么东西!——一伙凶恶的强盗!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!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!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势不两立的,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,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!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坚硬的。”

国民党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来劝说:“我想忠告你,你们既已失败至此,何必尽着固执,到国外来做事好了。”“不然杀了多多少少你们那方的人,何以还留着你们不杀呢!老实说,上面要用你们啦,收拾残局,要用你们啦!”方志敏说:“我可以告诉你,要知道,留在苏区的共产党员,都是经过共产党的长期训练,都是有深刻的主义和信仰的。”钱协民说:“孔荷宠是你的同志吧?他现在极蒙上面

36岁的方志敏为了信仰慷慨赴死。